

現代化理論 vs. 政權穩定論 ：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

吳玉山*

摘 要

眾所周知在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主宰比較政治領域，並且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又重新興起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paradigm)最重要的命題便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如此看來在中國大陸上由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高速成長將會促成政治改革。然而另外一個關於政治變遷的經濟社會理論 - 政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 - 卻認為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高速經濟發展會鞏固威權統治，壓抑民主力量。以中國大陸的例子來看，政權穩定論認為成功的經濟改革會替代政治改革，持續提供中國共產黨政權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很明顯地，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對於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對於威權統治所產生的影響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本篇論文將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加以比較，並且探討二者對於中國大陸的適用性。我們的結論是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在經濟改革的過程當中，先是如政權穩定理論所預測的上升，然後會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下降。和此一現象相對應的是社會對於民主的需求(包括內在性的需求和工具性的需求)會先下降，然後再上升，因而形成一個“U”形的上凹曲線。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就長期而言，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動帶來了內在性的民主需求，而經濟成長的趨緩也提升了工具性的民主需求。這個新的模式，主要是用時間序列將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融合在一起，對於中國大陸政治變遷的經濟社會背景提出了更細膩的看法。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晚近民主化的理論可以概略分為兩大類，一類強調事件發生的前提（preconditions），一類強調民主化的過程（process）。這兩類理論在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文獻中是相互競爭的兩種方法論。它們的重點各有不同。前提的研究法特別強調總體的政治社會因素，例如階級結構，然後把它和政治發展的結果關聯起來，這是傳統的研究典範。至於過程的研究法則主張政治變遷的結局沒有辦法用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的條件來決定，行為者的策略、彼此間互動的模式、事件發生的順序等對政治發展的過程都會產生影響。

前提途徑的理論大約可分為四群¹。它們是經濟社會理論²、政治文化理論³、國家自主理論⁴、和國際影響理論⁵。這四群理論，加上過程途徑，構成五種解釋政治變遷的主要學說。在民主化的文獻當中，雖然相當重視過程途徑，但是傳統的前提論仍然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強調前提的各家理論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就是現代化典範（modernization paradigm）。這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學說，對於許多民主化的個案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在這篇論文當中，我們要討論將現代化理論運用在中國大陸政治發展上的情形。眾所周知現代化理論最重要的命題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如此看來在中國大陸上由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高速成長將會促成政治改革。然而另外一個關於政治變遷的經濟社會理論 - 政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 - 卻認為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高速經濟發展會鞏固威權統治，壓抑民主力量。以中國大陸的例子來看，政權穩

¹ 參見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民國八十四年）。

² 例如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³ 例如 Giuseppe Di Palma, "Legitimation from the Top to Civil Society: Politico-Cultur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October 1991), pp.49-80; 及 Giuseppe Di Palma, "Why Democracy Can Work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 no. 1 (Winter 1991), pp.21-33.

⁴ 例如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⁵ 例如 D.W. Spring, *The Impact of Gorbachev: The First Phase, 1985-90* (London: Pinter, 1991) 及 Charles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定論認為成功的經濟改革會替代政治改革，持續提供中國共產黨政權一黨專政的的合法性。很明顯地，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對於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對於威權統治所產生的影響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本篇論文的第二個重點就是將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加以比較，並且探討二者對於中國大陸的適用性。我們最後的結論是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在經濟改革的過程當中，先是如政權穩定理論所預測的上升，然後會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下降。和此一現象相對應的是社會對於民主的需求（包括內在性的需求和工具性的需求）會先下降，然後再上升，因而形成一個“U”形的上凹曲線。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就長期而言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動帶來了內在性的民主需求，而經濟成長的趨緩則提升了工具性的民主需求。這個新的模式，主要是用時間序列將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融合在一起，對於中國大陸政治變遷的經濟社會背景提出了更細膩的看法。

壹、現代化典範

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是現代化理論的一貫思路。從政治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英國的社會學大師史賓賽(Herbert Spencer)，將歐洲社會學傳入美國的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政治社會學著名學者李普賽(Seymour Martin Lipset)，到專研民主化的當代政治學大師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無一不認為經濟的發展會帶來社會的劇烈變遷，價值的多元化，以及用民主制度整合各種利益的要求⁶。

一般來說，現代化理論所強調的是經濟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之間的關聯。它們有些認為先進的工業科技和社會分化要求一定的制度設計，否則無法發揮功能。一個複雜的，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必然會要求多元的，民主的政治體系。有些現代化理論認為在經濟高度發展之下，只有民主體制可以提供政權合法性。對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而言，雖然科技的發展不足以直接解釋民主現象，但是經濟的進步和教育的普及解放了

⁶ 關於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可參考 Andrew C. Janos, *Politics and Paradigms: Changing Theories of Change in Social Sc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1,2。

人類要求被承認的欲望，而此種欲望只有在普遍交互承認的民主社會當中才能獲得滿足。於是經濟發展、承認欲望和民主制度環環相扣，結果還是走上了現代化理論的預言⁷。

在諸多用現代化模式來解釋共產國家政治變遷的理論當中，最著名的首推羅文滔 (Richard Löwenthal)。根據他的觀點，國家發展的必要性終於會壓倒革命的理想主義，共黨對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執著終會不敵經濟發展的需求。現代化和西方化是所有想要發展的國家所必須採取的途徑，因此共產國家的政治體制終不免要向自由化和多元化轉型，這就是有名的「發展對烏托邦」 (development vs. utopia)⁸。依循著這個思路，列文 (Moshe Lewin) 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將蘇聯逐步推向多元社會。在《戈巴契夫現象——一個歷史的詮釋》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當中，列文認為蘇聯城市的興起，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即使是共產黨的幹部也現代化了。列文發現「民間社會」 (civil society) 逐漸在蘇聯出現，造成國家權力的弱化。彼謂：「城市是民主的搖籃」，可說是此一途徑的最佳說明⁹。而 Lucian Pye 也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使「現代化理論終於獲得了昭雪」 (the vind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y)¹⁰。

將現代化理論適用於共產主義國家有一個特殊的困難，那就是這個理論通常假設中產階級 (bourgeoisie) 是推動民主化的主力。現代化帶來了中產階級的興起，而中產階級自發地產生了對民主的要求。例如 Barrington

⁷ 參見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台北：時報文化，民國八十三年)，頁 vi-x。

⁸ 參見 Richard Löwenthal,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以及其 "On 'Established' Communist Party Regim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7, no. 4 (December 1974), pp.335-58; 和 "The Post-Revolutionary Phase in China and Rus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16, no. 3 (September, 1983), pp.191-201.

⁹ 見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¹⁰ Lucian W. Pye,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1 (March 1990), pp.3-19.

Moore 在其名著《獨裁與民主的社會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中即以獨立而強大的中產階級做為民主出現的必要條件¹¹。然而在共黨統治下的國家，一切重要的生產工具都歸國有，並沒有真正的中產階級。蘇聯模式的現代化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五年計劃達成的，而不是依靠私有制和市場。財產權的不同使得社會主義國家缺乏歷史上在西方推動民主化的主要階級¹²，這似乎意味著在列寧主義制度之下民主將難以發軔。可是事實並非如此。舉例來說，東歐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波蘭的團結工聯（Solidarity）正是產業工人在知識分子的帶動下為實現民主所成立的組織。從這裡可以看出，現代化理論必須捨棄將中產階級作為民主唯一動力泉源的說法，而將現代化對各階層的影響都納入其理論之內，方有可能解釋共產主義國家政治變遷的現象。

如果我們暫時把誰是民主制度的創造者這個問題擺在一邊，現代化理論似乎可以解釋為何不同國家的共黨政權會走上不同的路徑。舉例來說，東歐的北三國（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經濟發展的程度最高，而這三個國家的共產黨要不是本身發動了民主改革，就是在社會的壓力底下迅速屈服，幾乎完全沒有反抗。然而在南方的巴爾幹半島，經濟發展程度遠比北三國來得低，對民主運動的反抗也要強烈的多。羅馬尼亞在巴爾幹諸國中經濟發展程度僅略高於阿爾巴尼亞，而落後於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在一九八九年，就是在羅馬尼亞，喬賽斯古（Nicolae Ceausescu）的獨裁政權用武力血腥鎮壓民運，拼戰到最後一刻。羅馬尼亞的例子，可以視為經濟落後地區共黨政權面對民主化壓力的反應模式。

這種理論也可以用到亞洲。北韓，中國大陸和越南都是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就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來說，這三個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家比較羅馬尼亞還要低。經濟落後代表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普遍、人民的教育水準低、知識分子少，共產黨的幹部也比較僵化教條。東歐和蘇聯大部分的共黨政權或是發動從上到下的政治改革，或是迅速地向社會要求民主的壓力屈服，除了羅馬尼亞等少數的例子外，沒有看到武力鎮壓的情況。其原因應該是

¹¹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¹² Paul G. Lewis,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Coexistence*, no.27 (1990), p.253.

在這些國家民間社會已經伴隨經濟發展而逐漸成長，使得共黨政權喪失了強力鎮壓的意志和能力。然而，在中國大陸，就在民主浪潮席捲東歐的前夕，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中國共產黨不恤民命，血腥鎮壓，大肆搜捕民運份子，成功地鞏固了政權。由此可以看到中國大陸上民間社會的虛弱。不少論者認為大陸的政治局勢能保持穩定的原因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不響應城市知識分子的訴求。由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經濟發展的程度對民主化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至於北韓和越南，社會力量更為幼稚，至今沒有看到任何對共黨政權的嚴重挑戰。

對現代化論者而言，缺乏經濟發展會阻礙民主，然而快速的經濟成長卻可以開創民主的契機。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表現最為突出，而越南也緊追其後。大陸近年來兩位數的經濟成長使得不少學者認為自由化和民主化終於會在大陸實現。懷特 (Gorden White) 的《騎虎難下》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便是這種說法的代表¹³。

懷特依據現代化理論的傳統看法，認為大陸的經濟改革已經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以及意見的多元化。人們的期望不斷升高，新的社會團體逐漸興起，民間社會的力量也日益壯大。他認為雖然我們對大陸目前政治局勢的走向不能妄下斷語，但是從長期來看，中國大陸的民主前景是光明的。古德曼 (David Goodman) 的預測則更為樂觀。他認為「生產的驅力」 (production imperative) 會使得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家大幅度地修正他們的計劃經濟，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其結果必然是建立利益表達的管道，成立自由民主的制度¹⁴。

現代化論者除了強調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會帶來社會的變動以及政治的多元化之外，也很著重經濟改革對於專制政權本身的影響。在沃德 (Andrew Walder) 所編的《共產國家的衰落》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一書當中，提出了中共政權如何受到經濟改革的影響而逐漸喪失了專權獨斷的能

¹³ Gorde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¹⁴ David S.G. Goodman, "Communism in East Asia: The Production Imperative, Legitimacy and Reform," in Goodman, ed., *Communism and Reform in East Asia* (London: Frank Cass, 1988).

力。這其中的機制包含了思想控制的鬆弛、價值壟斷的喪失、預算外活動的增加、工會的獨立、就業計畫的減弱、對企業資金掌控能力的減少、地方幹部由行政長官蛻變為中間人、以及政府在少數民族區域權威的降低等¹⁵。凡此種種都是強調經濟發展對於專制政權所帶來的影響¹⁶。不過雖然我們在概念上可以區別經濟發展對於政權的影響（國家能力的衰落）和對於社會的影響（民主需求的增加），但是這兩者通常是互為表裏的。沃德的觀點仍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化的契機，而這也就是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命題。

貳、政權穩定理論

經社條件對民主化的影響並不止於現代化論者所述的一途。另外一條重要的思路是經濟表現對於政權穩定的影響。依照此種政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的看法，如果威權體制能夠帶來良好的經濟表現，則其合法性會增強；如果經濟產生重大危機，則其合法性便會減弱。因此重點不是在於威權體制有沒有實行經濟改革，而是其經濟改革的成效如何。此種理論甚至判斷即使沒有實行經濟改革，只要經濟表現良好，則專制政權便毋需擔心其體制的穩固性，也不需要從事任何體制改革¹⁷。

從實例上來看，在過去的蘇聯和東歐，經濟成長的趨緩以及物質生活

¹⁵ 參見 Andrew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與 Yu-Shan Wu, "Review of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December 1996), pp.949-950.

¹⁶ 匈牙利的社會學家賽勒尼 (Ivwn Szelnnyi) 在其名著《社會主義企業家》當中分析了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將匈牙利鄉村的共黨幹部變成了紅色企業家，開啟了經改影響共黨政權研究的學術領域。參見 Ivwn Szelnnyi, *Socialist Entrepreneur: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¹⁷ Yu-Shan Wu, "Resisting Reform: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Reaction Mode of Mainland China, Romania, North Korea and Vietn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4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 September 1-4.

的困窘確實是一般人民對體制失去信心的重要因素。許多學者提出，中央計劃經濟（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在各種生產因素尚未充分動員的外延式成長時期（extensive growth period）確實可以用強制的方式調動因素，帶來高速度的經濟成長。可是一旦生產因素已經充分就業，經濟成長就必須仰賴於生產力的不斷提高，這是內涵式成長時期（intensive growth period）的必然現象。東歐各國在一九五 和一九六 年代逐漸進入內涵式成長時期，但是中央計劃經濟在配置資源、激勵工作熱忱、傳遞信息和創新生產科技等方面都沒有市場經濟和私有制來的有效率¹⁸。於是生產力不見提高，而經濟成長也漸次趨緩。在此期間，蘇聯的低價能源供應，以及西方的大量借貸都曾發生延緩經濟危機到來的效用。但是到了一九八 年代末期，從蘇聯以降，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遭受經濟衰退的衝擊。這種狀況在和西歐各國對比之後，顯得益形嚴重。

由於東歐共產政權始終無法以體制內的改革來挽救其經濟，人民終於要求推翻共產制度¹⁹。在各東歐共黨政權當中，匈牙利和波蘭是民主化改革的先行者，而他們的經濟狀況也特別嚴重²⁰。相反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的經濟在東歐相對說來是較好的，而他們的共黨領導階層起初也比較少感受到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從這裡可以看出，經濟狀況和政治改革之間的確有密切的聯繫。

蘇聯和東歐的例子說明了經濟狀況的惡化促使人民對共黨政權採取反對的態度。這個命題反過來看正好可以解釋中共政權的相對穩定，也就是，在中國大陸上實行的經濟改革帶來了高速的經濟成長，從而挽救了中共政權的命運。這個看法在一九九二年以後經由鄧小平的堅持，逐漸成為中共

¹⁸ W.W. Rostow,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A Technological Time Warp,"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¹⁹ Richard E. Ericson,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the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5, no. 4 (Fall 1991), pp.11-27; Thomas A. Wolf, "The Lessons of Limited Market-Oriented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5, no. 4 (Fall 1991), pp.45-58.

²⁰ 例如 Nigel Swain 便將匈牙利共黨政權的崩潰歸因於社會主義制度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參見 Nigel Swain, *Hungary: The Rise and Fall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92).

的官方理解。事實上，正是由於這個理解，促成了鄧小平的南巡，和中國大陸上第二波的工業改革²¹。

在傳統的中國一向有「民以食為天」的看法，也就是強調人民對於基本物質生活的看重。為政者至少要讓人民「養生送死無憾」，否則就要面對強大社會力量的反對，因此政權穩定理論和傳統的中國統治哲學其實是一致的。在鄧小平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策略具體而言就是「填飽人民的肚子來防止人民作亂」。所謂「唯生產力論」、「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等都反映了這種思想²²。就此一意義而言，當今中國大陸的統治形態是傳統和復古的。當鄧小平在一九九七年二月過世後，繼任者江澤民雖然較為著重穩定，但是其政權依賴經濟表現來做為合法性最重要的泉源卻是和鄧小平時期別無二致的²³。

參、現代化典範 vs. 政權穩定理論

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對於中國大陸民主前景的描述很顯然有極大的差異。雖然二者都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是相當成功的²⁴，但是現代化論者認為此種快速的經濟發展會帶來相對應的社會和政治變動，創造成熟的中產階級，最終會形成要求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強大壓力。而政權穩定論者卻認為成功的經濟發展會鞏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統治，提供政權合法性，因而推遲民主發展的時機。這兩種看法顯然不可能同時正確。然

²¹ Jialin Zha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Down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Essays in Public Poli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²² 參見鄧小平，「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二二五。

²³ 關於江澤民的觀點，參見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載於翁杰明等編，《與總書記談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Yu-Shan Wu, "From Reform to Bureaucratic Stability in the PRC,"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3, no. 8 (August 1997), pp.81-104.

²⁴ 關於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成效，參見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民國85年）；與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

則是其中一種理論錯誤了嗎？

發生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似乎驗證了現代化理論的預言。年輕的北京大學生們勇敢地向中共政權要求自由和民主，並且獲得了上百萬北京市民的響應，形成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很明顯地這個運動的背景就是鄧小平已經推動了十年的經濟改革。在改革所帶來的寬鬆政治氣氛之下，中國大陸年輕學生的理想主義受到國際民主浪潮的衝擊，藉著胡耀邦之死和戈巴契夫的訪華而爆發出來。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一黨專政體制面臨了土崩瓦解的局面²⁵。這種種的跡象都和現代化典範所預言的相符，似乎在這個時刻政權穩定理論已經被證明為錯誤的。

然而接下來的發展卻又讓現代化論者大失所望。一方面六四民運被中共政權強力鎮壓下來，一方面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治理整頓」之後，大陸的經濟又重新起飛，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不但成長加速，而且通貨膨脹從一九九五年開始也獲得有效的遏制。中國人民似乎頗為滿足於在中共威權體制下所推動的經濟改革，大陸的政治趨於穩定²⁶。這又似乎代表政權穩定理論較現代化典範更能夠描述中國大陸的政經發展狀況。

為了解釋後天安門的政治發展，但是又維持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化」的核心命題，現代化論者開始提出各種階段性的說法，將民主化的到來延遲到未來。此一新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採取了在趙紫陽時期甚囂塵上的「新權威主義」的基本命題，認為民主化是一個兩階段的過程，不能一蹴而成²⁷。對於像中國大陸這樣的共產極權體制而言，第一步是先推動經濟改革，並且轉型成一般的威權體制；然後第二步才是推動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懷特在一九九四年對於中國大陸民主前景的討論就是新現代化理論兩階段說法的代表之作²⁸。許多學者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民代表大

²⁵ 關於各種推測中共體系會土崩瓦解的理論和預測，參見 George Hicks, ed., *The Broken Mirror* (Essex: Longman, 1990)。

²⁶ 參見 Richard Baum, "China After Deng: Ten Scenarios in Search of Reality," *China Quarterly*, no. 145 (March 1996), pp.153-175。

²⁷ 關於「新權威主義」，參見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台北：唐山，民國80年）。

²⁸ Gordon Whit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The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73-92。

會和地方村一級的基層選舉寄與厚望，也基本上遵循了新現代化理論的思路²⁹。像新權威主義的倡導者一樣，新現代化論者希望中國大陸能夠步台灣和南韓的後塵，在成功地發展了經濟之後，逐漸走向民主政治³⁰。

新現代化論的最大缺點是沒有直接面對政權穩定理論，而只是接納了一些「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或是經濟改革的關鍵時刻，威權體制有其必要性」的功能性命題，來合理化當前中共的一黨專政，然後將民主化的期望寄託於未來³¹。這就好像在比較共產主義的理論當中，有一批功能論者認為史達林式的極權統治符合馬克思所謂「原始積累」的要求，因此有階段的必要性，而一旦當原始積累已經完成，便不需要缺乏效率的極權體系，也因此多元政治便會出現³²。然而功能性的命題必須和實際的政治力量結合，否則在功能上累贅的政治組織和人物運用各種政治力量以延續本身存在的事實，在所有的政治體制當中都不乏見，而這些現象都沒有辦法用功能主義來加以解釋。新現代化理論必須直接面對政權穩定論的挑戰，說明何以當前民主的條件並沒有成熟，而在未來民主卻一定會實現。否則在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議題上新老現代化理論都難脫「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之譏。

肆、用時序聯結現代化和政權穩定理論

現代化理論強調經濟發展以及由其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會產生要求民主

²⁹ 參見 Emerson M.S. Niu and Tianjian Shi, "An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Electoral Systems Used in Chinese Village Election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26th annual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College Park, June 9-10, 1997; 以及 M. Kent Jenning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2 (June 1997), p.370, 371.

³⁰ 參見 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after Deng,"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3 (May/June 1996), pp.63-78。

³¹ 關於政權形式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參見 Jagdish Bhagwat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 no. 3 (1992), pp.37-44; 以及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

³² 參見 Yu-Shan Wu, *Compara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Mainland China, Hungary, the Soviet Union, and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4。

的壓力。政權穩定理論則認為人們的經濟生活境遇決定了他們對政權的態度，因此當共黨政權成功地實行了經濟改革，顯著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之後，政治穩定就隨之增加。另外一方面，當共產國家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沒有辦法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的時候，民主的壓力就大增。這是因為在共產主義國家人民所羨慕的西方各國，豐富的物質生活都是伴隨著民主的政治體制。現代化理論所強調的是一種長期性的，由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政治文化變遷，民主在此被視為一種內在的價值（intrinsic value）。政治穩定理論則以民主為一種工具，是達到豐裕物質生活的手段，因此僅具有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當專制的共黨政權沒有辦法滿足人民對物質生活期望的時候，人民就捨棄專政，追求民主。

這樣的兩組命題並不一定會衝突。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程度的高低決定對民主的需求，也就是經濟發展程度低則對民主的需求低，經濟發展程度高則對民主的需求高。當然在經濟變項和內在民主需求之間必然有一些社會變項（例如社會流動）做為中介，然而這並不妨礙經濟發展程度和內在民主需求之間的關聯³³。政權穩定理論認為經濟表現，而非經濟發展程度，決定人民對於民主的需求，也就是經濟表現佳則專制政權的合法性高，而對民主的需求低，而如果經濟表現差則專制政權的合法性低，相對應的對民主的需求也就高。接受了上述的兩組命題之後，我們可以得出四種狀況，第一種狀況是經濟發展程度低而經濟表現差，第二種是經濟發展程度低而經濟表現佳，第三種是經濟發展程度高而經濟表現佳，第四種是經濟發展程度高而經濟表現差（參見表一）。在經濟發展程度高而經濟表現差的場合（狀況四），民主的需求不論就現代化理論或政權穩定理論而言，都是比較高的。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程度低而經濟表現佳的場合，民主的需求不論就現代化理論或政權穩定理論而言，都是比較低的（狀況二）。問題的產生就是在於另外的兩個組合：經濟發展程度高而經濟表現佳（狀況三）、以及經濟發展程度低而經濟表現差（狀況一）。

如果一個威權體制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低而經濟表現又差，則唯一可能產生的民主需求是工具型的。此時端視西方富裕國家的示範效應大小如

³³ 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 no. 3 (April 1971), pp.283-322.

何，人民會產生對民主程度不同的期盼。然而就算對民主的需求偏低，由於不滿意政權的經濟表現，政治穩定也有可能無法持續，而產生動亂甚且革命。另外一個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無法合致的場合是經濟發展程度高（因此有內在的民主需求），而經濟表現也佳（因此沒有工具性的民主價值）。在下列表一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現代化典範和政權穩定理論所延伸出的四種不同狀況，以及對於民主需求所帶來的影響。

表一：經濟表現、經濟發展程度與民主需求

		經 濟 發 展 程 度	
		低 (無內在性民主需求)	高 (有內在性民主需求)
經濟表現	劣 (有工具性民主需求)	狀況一 僅有工具性民主需求	狀況四 兩方面民主需求均高
	佳 (無工具性民主需求)	狀況二 兩方面民主需求均低	狀況三 僅有內在性民主需求

進一步來看，現代化理論所強調的經濟發展程度是一個絕對的概念，在這裡我們可以用平均國民所得等總體經濟指標來加以運作化（operationalize）。政權穩定理論所著重的經濟表現則是一個增量的概念，適宜用平均國民所得的年增率等經濟指標來加以數量化。為了將這兩個概念圖形化，在下面的圖一當中，我們描繪了一條經濟發展的曲線 G，其中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從低到高，然後再由高到低。曲線 G 的斜率由曲線 L 來表示。在圖一中可以看出，L 是一條上凸的曲線。這條曲線的形狀是基於一個經濟發展理論的假設，就是高速經濟成長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固然在起飛時期經濟成長可以大幅度躍進，但卻不能長久持續。經濟成長的速度在經濟體系逐漸成熟後會逐漸放緩，所以 L 會在上升到高度經濟發展的區域內後漸趨平緩³⁴。

由於政權穩定理論假設經濟表現（即經濟增長的速度）決定人民對於威權體制的支持度（即威權體系的合法性），所以 L 也可以用來代表威權政體的穩定度。由於工具性的民主需求是和經濟表現與威權穩定成反比的，因此代表工具性民主需求的曲線 R 便有和 L 相反的斜率，而成為上凹的形狀。在圖一中另外一條曲線 M 是用來代表內在的民主需求。基於現代化理論的假設，經濟發展程度愈高，內在的民主需求就愈高，所以 M 的斜率固定是正的。最後一條曲線 SUM 是 R（工具性民主需求）和 M（內在民

³⁴ 參見 Gerald M. Meier,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II.A.

主需求)的加總,代表在不同時點社會的總民主需求。整體來看, SUM 曲線在初期受到 R 線下滑的影響而向下延伸,但是隨著 R 的翻升和 M 的持續增長而逐漸趨平,最後快速揚升,顯示在考慮到政權穩定理論的命題之後,從長期來看現代化理論還是能夠提供正確的預測³⁵。

在表一中的四個狀況可以用圖一來加以顯示。首先是狀況一的情形,這是低經濟發展和不良經濟表現(低經濟成長)的組合。此時視西方富裕民主國家示範效應的大小,在此一經濟發展落後的威權體制國家當中會產生若干的工具性民主需求,此一需求是會隨著經濟表現的改善而快速遞減的。另一方面,由於整體的經濟發展程度很低,所以內在的民主需求不大。二者加總的結果,可由 SUM 在 T0 到 T1 之間的線段加以表示。如果運用到中國大陸,狀況一是毛澤東主政時的情景。由於中國大陸在此時對外封閉,因此西方(或台灣)的示範效應不強,而內在的民主需求又弱,因此當時民主發展的條件是相當欠缺的。

在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之初,也就是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八年的十年之間,是中國大陸初嘗經濟改革和快速經濟成長滋味的時期。此時總體的經濟發展程度還很低,所以內在的民主需求有限,而同時快速的經濟成長帶來了政權在一般民眾心中的合法性,所以工具性的民主需求也不高。整個的說起來, SUM 曲線降到最低點(從 T1 到 T2),這正是狀況二當中經濟發展低、經濟表現佳的特徵。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之所以未能持續擴大,主要就是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還正處於 SUM 曲線的低谷階段。雖然大學生和北京的居民比一般民眾發展出較強的內在性和工具性的民主需求,因此成為六四民運的主力,但是從全國的範圍來看,既沒有發達的經濟結構來提供內在性的民主需求,又沒有足夠的經濟危機來促使一般民眾反抗中共的一黨專政,因此天安門事件的風潮迅速消退,中共政權重新建立了穩定的政治

³⁵ 在此提出的各條曲線都是用來描述全國的情形,並沒有估計到不同區域的不同發展。例如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沿海省分、北京和內陸地區在經濟發展程度、經濟成長率、對共黨政權的支持度、現代化的影響、和總民主需求各方面都顯示出不同的情況,而此處我們所試圖表示的是在全國範圍內的綜合狀況。關於此點,筆者對於日本青山學院大學的天兒慧教授(Prof. Amako Satoshi)所提出的意見表示感謝。

局面。

接下來是狀況三的階段。此時經濟發展程度已經有相當水準，因此內在的民主需求大量增加。不過從工具性的觀點來看，由於 L 值在 T2 和 T3 之間仍然偏高，因此很少人會為了爭取更好的經濟生活而主張民主。就 SUM 曲線而言，此時斜率的遞增主要是因為 M 值的持續增加。如果從中國大陸的情況來看，狀況三約略合於後天安門時期，也就是一九九〇年代。此時中共政權的道德合法性受到內在民主需求的挑戰而劇減，然而其快速發展經濟的功能和作用仍然受到肯定，所以仍然能夠保有高度的政治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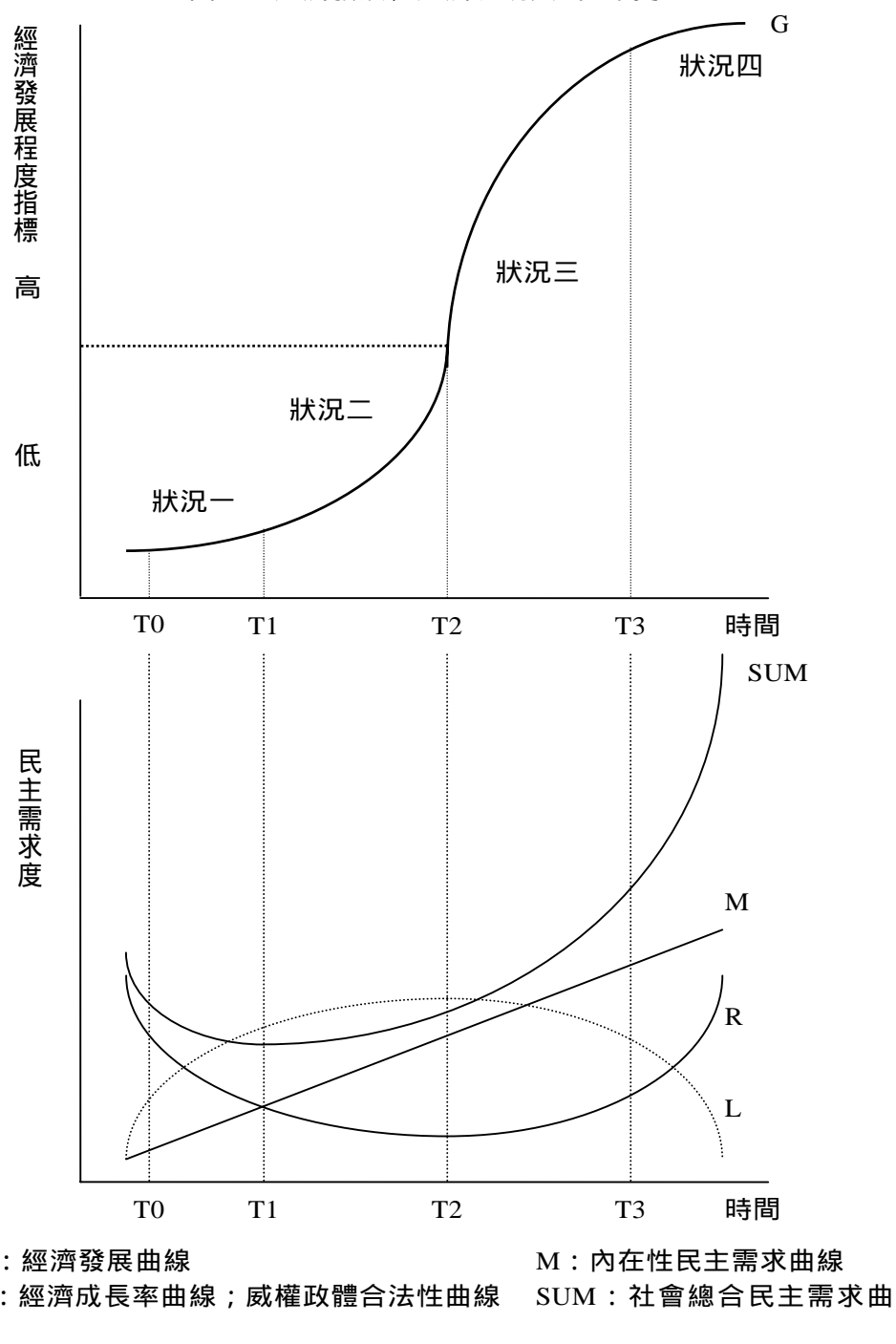
最後到了第四個階段。此時經濟發展的程度更高，代表民主的內在需求更大。另一方面由於人民已經習慣於快速的經濟成長，對於豐裕的物質生活逐漸視為當然，於是專制政權的工具性價值開始減弱，同時快速經濟發展的階段已經接近尾聲，成長率無可避免地下降。根據政權穩定理論，此時威權體制的合法性會相對下跌，而欲訴諸民主來改善物質環境的需求也會增加。於是在內在性和工具性民主需求雙雙上揚的情形之下，SUM 曲線快速攀升，達到最高點。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第四個階段會在經濟成長率（主要指人均的國民所得增長率）開始顯著下跌的時候來臨。

蘇聯和東歐國家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就是面臨了第四種狀況。既然現代化和經濟衰退都可以刺激人民對民主的要求，那麼在成功的現代化（經濟長期成長，都市化及工業化，大眾傳播普及，教育水準提高）之後如果出現經濟狀況的惡化，將會觸動長短期兩種對民主的要求，造成對現政權最大的壓力。蘇聯和東歐各國即普遍具有這個背景。這兩種趨勢可能有不同的承載者（carrier）。因為現代化而產生的民主要求很可能主要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身上，而因為本國經濟衰敗和豔羨西方的物質生活而追求民主的，可能主要是工農大眾。因此所謂兩種民主要求的匯合，其實是指社會上的不同階層為了不同的經社因素而同時追求民主。波蘭從一九七六年開始有知識分子和工人的結合，最後造就了團結工聯，推翻了波共政權³⁶。這兩股民主力量的背後，就反映了兩種經社條件的作用。不過用不同承載者來體現的不同民主需求是我們在經驗上的觀察，並沒有辦法從我們

³⁶ Jacques Rupnik, "Dissent in Poland, 1968-78: the End of Revisionism and the Rebirth of Civil Society," in Rudolf Tokes, ed.,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的模型當中直接演繹出來（參見結論）。

圖一：經濟發展、經濟表現與民主需求



伍、結論與討論的限制

本文指出了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論的衝突，並且將二者用時序加以聯結。在描繪社會總民主需求的 SUM 曲線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拗折點（turning point），落在狀況二，也就是 T1 和 T2 這兩個時點之間。在經過了拗折點之後，社會總民主需求就不斷遞增，而在時點 T3 之後達到高峰。SUM 曲線的形狀反映了現代化典範和政權穩定理論對於經濟影響政治的不同估計，我們將這兩者透過內在性民主需求和工具性民主需求加以聯結和加總，得出了對於經濟影響政治的總體看法，應該會對於理論的廓清和更進一步的討論有所助益。

本文的討論有以下幾項限制，在此應該加以註明。第一是我們並沒有估計非經濟因素對於民主需求的影響。這些外生變數（包括文化因素、國際環境因素等）也可以含括到此一模式當中。曲線 R、M、SUM 在引入不同外生因素的時候，會水平上下移動。例如一個民主政治文化較強的體系，在任何一個經濟發展程度的時點上，都會產生更高的內在性民主需求，也就是 M 曲線會水平向上移動，而帶來 SUM 曲線的水平向上移動。對於民主政治文化較弱的體系，M 和 SUM 曲線便會水平地向下移動。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消退，一方面固然是受到總體經社環境的制約，是狀況二之下缺乏內在性和工具性民主需求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民主政治文化的傳統太弱，知識分子以「諫諍者」自居，過度限制了本身的行動³⁷。

第二個值得注意之處是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指標曲線不一定相同，也因此曲線 L 和曲線 R 的形狀也會不同。事實上即使以中國大陸而言，L（人均經濟成長率）也不是平滑的³⁸。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和中國大陸 L 線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劇烈波動也有很大的關係³⁹。簡言之，劇烈的通貨膨脹和

³⁷ 關於此一論點，參見 Elizabeth Perry, "Intellectuals and Tiananme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an Aborted Revolution,"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³⁸ 參見吳玉山，「中國大陸派系鬥爭與經濟循環互動之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NSC 84-2414-H-002-037，民國 85 年。

³⁹ 參見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敗壞的經濟秩序侵蝕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使得在每一波緊縮政策之後社會都出現騷動。雖然從長期來看，中共政權由於處於狀況二而受惠於高速的經濟成長，與低落的工具性民主需求，但是經濟波動仍然會在大格局當中製造政治波濤⁴⁰。不過本論文由於對於經濟發展曲線採取了一個較為簡化的假設，因此更能夠解釋中國大陸較長時期的政治穩定⁴¹。

本文的第三個限制是我們將現代化論和政權穩定論運作化了之後，著重於觀察「民主需求」此一因變項，而「民主需求」是和「民主化」不同的。民主需求只是代表社會上追求民主的期望，或是爭取民主的行為，而並非民主體制的建立。就後者而言，過程論可以提供更好的討論架構。然而民主化的過程確實是在一定的經濟社會環境當中進行的，因此掌握總體的經濟社會環境應該還是研究民主化的第一步⁴²。

事實上民主需求的內涵也可以進一步細膩化。基本上它應該包含一種心理和意見上的傾向，不只是認同於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則，更表現出對於民主制度的偏好。更進一步的需求則是表達政治上的意見，相互溝通和建立組織，期望對於政治系統構成有效的輸入。從態度到表意到組織，民主需求的強度不斷增加，這就構成了前述 SUM 曲線上揚的一種內涵⁴³。民主需求增加的另外一種內涵是更多的社會成員接受了支持民主態度，或是採取了爭取民主的行為，這可以視為民主需求在廣度上的增加。強度和廣度是民主需求的兩個最重要的面向，這在我們的模式當中並沒有區別開。

本文第四個限制是我們所提出的理論架構並沒有探討經濟結構、經濟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4 (July 1995), pp.467-494.

⁴⁰ 參見吳玉山、林文程、江水平，《後鄧時期對大陸及台灣的震盪》（台北：國家發展文教基金會，民國 84 年），第三章。

⁴¹ 關於將經濟、文化、國際環境等因素整合成一個綜合的解釋架構，來探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轉型，參見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

⁴² 關於前提論和過程論的爭議，參見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關於將過程論運用在中國大陸，參見鄒讜，《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⁴³ 在此可參見對於「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討論。見周雪光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民國 81 年）。

表現和民主需求之間的中介變項，而只是很宏觀地將經濟和政治聯結起來。例如經濟結構如何對特定的承載者產生作用，而促成特定的政治行為，這就落入了本文的討論範疇之外。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the PRC: Modernization Paradigm Revisited

Yu-Shan Wu

Abstract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that dominated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resurged in the 1980s is centered on the theme tha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ll bring about political openness and democracy. Based on this theorem, one may predict that the high growth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is bound to lead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other theory on this matter, the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asserts that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d by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ends to strengthen its rule and facilitate the suppression of democratic forces. When applied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predicts that economic reform will be substituted for political reform to provide legitimacy fo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pparently modernization paradigm and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predict different impa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mpare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and the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and to explore their respective applicability to the mainland Chinese case. It is found that the legitimacy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first rises with successful economic reform, as predicted by the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then declines following the

predic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thus forming a “U” curve. It is the case because modernization fues intrinsic demand for democracy. This new model combines the theoretical thrusts of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and the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to provide a sophisticated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